

国际关系

论跨国人口迁移对当代国际安全的挑战

阮征宇

〔摘要〕 自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使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成为国际社会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正不断改变着世界各国及地区的人口比例和组合结构,而且由其带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全球流动又使世界经济获益良多;同时,大量事实表明,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持续拓展已对当代国际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

〔关键词〕 跨国人口迁移;国际移民;国际安全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3)04-0021-27

20世纪70年代,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在其著作《面临威胁的星球》中曾指出,跨国行为体的发展及其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将构成新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础之一。^{〔1〕}自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跨国人口迁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作为一种现象,本文所用的“跨国人口迁移”与“国际移民”为同一概念,是指人口跨越政治边界的迁徙或流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人口迁移对国际社会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不断改变着世界各国及地区的人口比例和组合结构,解决了部分地区的劳动力匮乏问题和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趋势,由其带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全球流动使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获益良多,以美国为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与跨国人口迁移伴生的非法移民与难民问题、跨国犯罪与环境破坏等难题亦使各国政府不胜其烦。19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出现了反移民

的运动,间或发展成为反对少数民族的种族冲突。1992年洛杉矶的种族大骚乱,同年新纳粹分子在德国对土耳其移民的攻击,都给各国人民和政府留下触目惊心的印象。2001年的“9·11”事件更使人们认识到,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跨国人口迁移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持续拓展已对当代国际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本文主要将就跨国人口迁移对当代国际安全中的人才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以及环境与社会安全等方面所构成的挑战进行论述。

一、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的加速流动,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才安全危机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水平的不平衡发展历来就是移民的强大动力。因此,对致力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如何维系本国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就是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大量的人口流动使得移出国或地区发展所需的基本劳动力不断贫乏,而大量高知

识和高技术人才的移民又使移出地的人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人才外流对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低度发达国家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也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方面,随着移民链(chains of migration)的发展,某些特定地区的青壮人口将出现集体性人口迁移的趋势。如果人口迁移的数量在当地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过高,就势必导致当地劳动力的匮乏,使得移出地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村庄和城镇的经济发展也将因人口外流而陷于瘫痪。另一方面,知识型人力资本的外流对移出地的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在当代国际移民现实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竞争下的人才流动与分布的不均衡性,也即少数发达国家依赖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全球范围抢掠人才,集聚了大量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资源的出现“空心化”。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事实上也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变相的技术转让,而这种“转让”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更加处于劣势。例如,居住在美国的100万印度移民,只占印度人口的0.1%,但其产生的价值却相当于印度国家收入的10%。^[3]

综合国力的竞争在一定层面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人才流失的影响将是致命性的。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也饱尝人才流失之苦。俄罗斯族之迁入中亚始于19世纪80年代沙俄的军事征服。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政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向中亚地区派遣了大量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专家、教师、医生等。到1980年代初,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总数达到近1000万。^[4]前苏联的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使中亚俄罗斯人受到当地主体民族主义的冲击,在短短几年内就有数百万人离开中亚迁返俄罗斯。截止到1998年,迁离哈萨克斯坦的俄

罗斯人约有130-200万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人也从1990年的91.8万减少到70万人。在这些移民的俄罗斯人中,有65%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其中年轻人占25%,接受过中、高级教育的占45%,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教师、医生、科技和管理工作者及工程师等专业人才。俄罗斯族人才的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

事实上,人才的流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只要存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异,人才的流失就不可避免。据de Tinguy的统计,1994年到1996年间,从俄罗斯去加拿大、美国、以色列、希腊和德国的移民中,拥有大学学历的移民分别占到移民数量的50%、45%、34%、25%和17%以上。^[5]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历史原因,国内社会经济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人才的外向流动存在较大的“推力”和“拉力”,使得其人才的流失构成关乎社会与经济发展动力的人才安全问题。人才的流动既存在着因加强了对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学习而有利于增进国家安全的本国发展的一面,也容易导致人才的流失,从长远看对移出地国家的综合国力发展构成了挑战,形成人才安全问题。

二、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的加速流动改变了移入地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态,对移入地国家的政治安全构成威胁

“国际移民的最为持久的意义,也许正是其对于政治的影响。”^[6]国际移民塑造了国际社会,与此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对国际政治生活产生影响。通常,人们认为国际移民是一个重要的、但是与政治并无关联的经济与社会现象,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与早期移民通常是短期的临时劳工(the temporary workers)有很大关系。这种类型的国际移民在赚到预期的金钱后就打道回府,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因此,与移入国的政治并无多少纠葛。极少有人在二战后能预

见到,西欧国家当时招募外国劳工的政策,对日后的西欧社会政治生态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国际移民具有两重性,它既是政治行为的主体,又是政治行为的客体。它既是政治行为的参与者,又是政治行为的所指对象。对国际社会而言,后冷战时代跨国人口迁移对国际安全的挑战尤为显著地表现在国际移民与国家或地区政治安全的关系上。

在西欧,移民问题诱发了右翼势力的抬头。在对待移民问题上,欧洲各国极右势力有相同或类似的看法,几乎所有极右势力都以“排外”为其主要的政治诉求之一。例如,“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其纲领中公开主张“反对外国移民,反对双重国籍法,赶走犯罪的外国人”和把“劳动位置应留给德国人”。由反对外国移民而起,他们进一步提出反对欧盟东扩,原因是他们认为“欧盟东扩只会花德国更多的钱并带来更多移民”。法国“国民阵线”的政治纲领《300条措施》主张:废除反种族歧视的法律,把“国民优先”原则引入宪法;要求改革国籍法,以血缘确定法国人国籍;有组织地遣返外国人等等。意大利极右翼组织“三色火焰”和“法西斯与自由”亦主张排斥外国人。^[7]

西欧极右势力崛起的原因与背景十分复杂,但部分选民对移民问题的担忧,是其主要的社会成因。^[8]冷战结束后,东欧地区特别是前南联盟地区的社会动荡和战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向西欧国家,造成严重的难民和移民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移民问题也就更加突出。近三分之二的欧盟国家公民对欧洲大陆1800万合法移民和大量的非法移民表示担忧,认为这些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使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和国家福利预算变得紧张起来。随着欧盟东扩进程的发展,将有更多的移民涌入西欧。一些选民希望通过支持极右翼政党来阻止外来移民的流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富裕生活水平。极右翼政党紧紧抓住这些选民对移民问题的恐惧心理,大

力宣扬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得到许多选民的拥护。因此,自1999年奥地利极右的自由党人入阁后,欧洲政治版图的“玫瑰潮”正在改变颜色。^[9]在挪威、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和荷兰等国,新兴的极右翼政党频频在选举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相继进入议会,有些还同传统右翼组成联合政府,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生态面貌。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东南亚地区。在马来西亚,外来移民已经成为影响马来西亚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自1960年代独立以来,马来西亚联邦一直是一个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组成的多元种族社会。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问题本已因为三大族群之间不同的比例和出生率而异常敏感,^[10]而近年来与马来人同文同种的印尼人和菲律宾人不断以劳工或非法移民方式涌入马来西亚,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马来西亚各种政治力量对大量移民的流入十分关注,非马来人政党更是如此。在华、印两族的政治势力看来,这种状况将促使政治力量的天平倾向马来人,对此他们都报以严厉的批评。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交错在一起,使得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另外,敌对的海外移(侨)民团体往往也会成为一股令移出政府头疼的颠覆性力量,一旦与国内的反政府行为结合,势必对移出国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产生严重冲击。历史上,移民通常成为国家间角力的重要武器,给当事国带来重大的安全问题。在冷战的最黑暗时期,出于遏制战略的需要,美国政府在整个1960和1970年代接纳和安置了80多万古巴难民,将其视作反击苏联扩张、保卫西半球免遭“共产主义思潮”侵袭的战略工具。同时,美国还频频利用这些在美古巴流亡分子从事颠覆古巴政权的各类活动,最为著名的就是1961年4月17日古巴流亡武装在美国军舰的保护下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11]

不友好、甚至敌对的外侨集团对侨居国的政治安定也带来了负面影响。1980 - 1990 年代间,库尔德工人党在德国的活动即是一例。德国在战后重建时期,招募了大量的土耳其工人,迄今为止在德国定居的土耳其人已达 200 万,其中,约有 50 万是库尔德人。^[12]自 1980 年代以来,土耳其库尔德人一直谋求从土耳其的控制下获得独立或自治,在库尔德人的运动中,出现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库尔德工人党(Kurdish Workers Party, the PKK)。在德国的库尔德人中,至少有 5 万人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同情者,近 1 万人是其活跃分子。在该党领导下,库尔德人在土国境内展开了一系列反对当局的武装斗争。但是,更使德国和土耳其政府伤透脑筋的是,库尔德工人党居然将德国开辟成反对土耳其统治的第二战场,开始在德国和西欧频频袭击土耳其驻外使领馆、国际航班和商务机构。1990 年代中期,由于德国在清剿库尔德工人党问题上与土耳其政府展开合作,该党领袖奥贾兰(Ocalan)甚至宣称将以哈马斯式的自杀性炸弹袭击报复德国政府。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严重损害了德国和西欧国家的国内稳定。另外,在东帝汶的独立进程中,外来移民亦成了阻碍东帝汶独立的重要力量。由于担心东帝汶独立后丧失特权地位并成为报复的对象,因此,东帝汶的印尼移民和其他在印尼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一起,反对印尼军队撤出东帝汶,主张维系东帝汶和印尼的关系,为此甚至成立了民兵武装,制造了多起针对支持独立的平民的流血事件,一时间造成了地区局势的紧张,恶化了印尼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关系。

三、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的加速流动易使相关国家之间的固有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是导致地区动荡和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

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引发着政治、社

会与文化认同的危机。什么人属于“我们”的人,对一个民族的社会与文化认同非常重要。对于生活在一个特定地域内的社会共同体而言,共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是该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移民的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差异势必对移入国的文化、风俗、语言和宗教等社会秩序提出挑战,对原有的社会文化和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由于社会文化认同的差异特别是宗教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冲突在一些地区甚为严重。例如,因 17 世纪以来大批信仰新教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人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移居到爱尔兰东北部的厄尔斯特地区,引发了在当今世界上颇为引人关注的北爱地区新教移民和天主教原住民之间民族和宗教矛盾不断发展而成的北爱尔兰问题。英国政府在解决北爱问题上的表现拙劣,而激烈的民族冲突使爱尔兰人既无法与英国移民分享权力,又无法合法脱离英国,从而促使爱尔兰激进民族主义运动急剧发展,进而导致恐怖主义暴力浪潮逐渐蔓延到整个英伦三岛。据英国官方公布,1970 - 1981 年间,仅北爱尔兰地区就发生了 28553 次枪击事件和 10523 起爆炸案,共导致 2158 人丧生,其中包括 166 名警察和 345 名军人。另外还有 17115 人受伤,其中许多人终身残疾,包括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内的许多政要都成为袭击目标,其中撒切尔夫人政治顾问艾雷·尼夫和海军元帅蒙巴顿勋爵等著名人物遇刺身亡。^[13]

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也极易影响国与国的双边关系。1980 年代尼日利亚政府驱逐 70 万加纳籍劳工,这项决定立即恶化了尼日利亚与加纳的双边关系。对中国而言,近年来接连发生的“第三人”闯入外国驻华使领馆与驻华机构事件,既直接危害有关使领馆与安全,也是对中国法律的挑衅,影响了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

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对国际安全影响

的极至,便是成为引发国家战争的诱因与导火索。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起源就与难民问题密切相关。1971年,围绕东巴争取更大的自治权问题,东巴与中央政府所在的西巴发生严重矛盾,引发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危机。随后,巴基斯坦政府在东巴采取的军事镇压导致了大量难民逃亡印度。1971年约有1000万东巴(孟加拉国)难民因为宗教、政治和土地等原因涌入印度,引起了流血冲突。^[14]印度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以消除难民问题的冲击为借口发动了战争。11月22日,印度对巴基斯坦不宣而战,向东巴发动全面进攻,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在这场冲突中,印度利用了巴基斯坦的国内危机、国际上的孤立、苏联提供的支持和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等有利条件,实现了它在南亚次大陆的部分战略目标,削弱了巴基斯坦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南亚次大陆上最具优势的国家。^[15]1969年萨尔瓦多移民引发的“足球战争”又是另一类例子。^[16]

四、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的加速流动对全球生态环境和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挑战

在当代,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跨国移民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国际犯罪活动的发展往往与人口的跨国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安全面临国际移民这一新的非传统安全因素所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首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非法移民与人口走私问题日益严重。在世界范围内,人口走私是一笔大生意。前美国移民和归化局(INS)反偷渡负责人詹姆斯·沙帕罗(James Shaparro)接受《美国参考》的采访时说,尽管无法得到精确数字,但估计这一地下产业每年的生意额在40亿美元到140亿美元之间,最常被引用的数字是70亿美元。他认为,每年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高达4万人。^[17]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的估计,全球人口走私贸易数量目前每年约65万。^[18]自“多佛尔事件”发生以来,有关

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在当前,由于人口走私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有组织跨国犯罪行为。

其次,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通常利用合法或非法移民的方式入境,然后再伺机制造破坏性恐怖主义事件。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中的嫌疑分子就是利用加拿大的移民身份进入美国的。“9·11”事件中,19名劫机犯中有3名是以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另两个劫机犯谢赫和阿塔则以旅游签证入境。而在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则与走私贩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再次,大量的跨国犯罪混杂在人口迁移的的每一个环节,使得国家、社会和居民对移民产生了强烈的戒心,对其自身的安全状况极端敏感。而事实上,国际移民本身也是跨国犯罪的受害者,尤其是在德国和美国,恐怖主义等国际犯罪活动已经动摇了外来移民的法律地位。

最后,国际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境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安全问题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遗传资源、气候和其他军事专家和政治领导人很少考虑的因素,并且在未来将会越来越成为各国安全事务的核心。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引发跨国人口迁移以及国内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很多时候,国际移民又是引发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一个主要诱因。事实上,在国际安全、生态环境与国际移民之间亦存在着客观的联系,三者之间形成了一条利益悠关的安全之链。另外,在1977-1978年间,地处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就与环境灾难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大量的环境难民涌入,不仅加剧原来国家的动荡,还会传播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的环境问题,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和社会压力以及不安定因素。

五、余论

国际社会对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所带来的挑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国际社会对国际移民的影响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各国政府只是以零散的职能机构(如移民处、劳工局、福利与教育机构)来管理和处理移民问题。1980年代末叶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移民不仅关乎经济问题,同时还关乎着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各国纷纷设立高级别的专门机构和加强移民的立法工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移民问题,美国政府之设立国土安全部即为最好的例证。当前,各国政府尤其关注其控制移民与处理文化多元性的能力,正如1995年《申根协定》正式生效、欧盟内部的边界消失后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迅速制订条约加强对欧盟外部边界的控制那样,大多数国家都将移民纳入安全的框架予以限制。人类跨国迁移的自由,现在已经逐渐受到日臻完善的各国移民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制约。在30年前,全球大约有6%的国家政府对移民实行限制政策,而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0%。^[20]

传统的安全观是以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为核心的,将安全等同于军事安全,忽视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而新安全观念认为,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仍然是安全的核心,国家安全政策最为关注政治安全问题是正确的;但是,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与环境健康也是国家安全及其政策不应该也不可能忽视的问题,必须均衡考虑与实现国家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诸多方面发展的安全利益。在国际移民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对国际移民问题进行趋利避害的选择和利用,当是国家安全政策基本目标之一。

在全球移民时代,国际移民对于国际安全的重大影响,使得各国的安全政策莫不重视移

民与安全在各个方面的互动,并进而展开一系列相关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和改革。“9.11事件”以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加强移民监管制度、确保移民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的基本内容。此外,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为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除了加强“自助”以外,展开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双边、多边或全球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合作安全的作用已日益凸显。总之,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的加速流动不仅为国际安全视野添加了诸多非传统的安全新因素,也同时使当代安全观的内涵、要素和实现手段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变化。

[注释]

- [1] 参见[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 [2] 据联合国人口署2002年估计,全球移民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75亿,比1975年增长了一倍多。参阅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2*. New York: UN Sales Section, 2002.
- [3] 李术峰、张景勇:“警惕‘智力断代’——人才流失数据解读”,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北京3月12日电。
- [4] SHAMSHUR, O. 1995. *Migratory Movements and Migration Regulation in the FSU States: Evolution and Perspectives*.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Sciences. Euroconference on 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ugust 30-September 2 1995.
- [5] TINGU Y DE, A. 1997. ‘Dix Ans de Migrations Est-Ouest: Quelles Tendanc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New Migration Space. Pultusk (Poland), 11-13 December.
- [6]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2nd editi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p. 253.
- [7] 参见郑若麟:“欧洲政治风向右转”[N],《华南新

- 闻》2002年4月24日;冯坚、张征东:“欧盟收紧移民政策的背后”,新华社2002年6月23日。
- [8] 初玉国:“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前极右翼势力分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M],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6页。
- [9]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盟15国中有13个由左翼政党掌权,被称为“玫瑰潮”。
- [10] 按当时人口比例,马来人占人口总数的49.3%,而华人和印度人两大非马来人分别占38.4%和10.8%,加起来几乎与马来人相等。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在人口比例上势均力敌不仅是影响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首要因素,也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和政治稳定的关键,三大民族人口数量的增减一直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关注,由于出生率的差异,独立后30年,马来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60%,占了绝对优势。
- [11] [美]托马斯·G·佩特森:“霸权的限度:美国于古巴革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
- [12]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2nd editi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p. 276.
- [13] 北爱尔兰新闻局:《事实与数据》[M],贝尔法斯特,1982年版,第20页;英国新闻局:《北爱尔兰回顾》[M],伦敦,1981年版,第3页,转引自洪建军:“北爱尔兰冲突的历史背景及发展方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M],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5页。
- [14] 在孟加拉国全国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多人移居印度边境的几个邦,那里的人口密度还不到孟加拉国全国人口密度的1/4。1983年的暴力冲突中,3000名孟加拉国人丧生;在印度的阿萨姆邦,1991年的一项人口调查表明,700万以上的人,即阿萨姆邦人口的1/3,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美]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 [15]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7、681页。
- [16] [美]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21—122页。
- [17] 参见Jane Morse:“尽管美国移民政策宽松,偷渡人口问题仍旧存在”,载于《美国参考》,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aliensch/shaparro.htm
- [18] IOM, *Combating Trafficking in South East Asia: A Review of Policy and Programme Response*, 2000.
- [19] 有关中国非法移民问题研究的报告和资料可参阅[美]彼得·邝:《黑着——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 [20] 翁里:《国际移民法理论与实践》[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作者简介:阮征宇,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政教室讲师,暨南大学博士生。(广州,510600)

收稿日期:2002-05-07